

岁月山河

走在大海边上

■ 李林青

在思考“大海”这个宏大的命题之前，我对于给我独特视角的大海总是抱以敬畏。海水有力的拍击，连绵起伏的波浪，海南原始海岸斑驳的日影，似乎在告诉人们，地上的热带植物正在以不屈的姿态，它们相互砥砺，矢志不渝。淳朴而又坚韧的海南人毅然驾着命运的帆樯奔赴大海，前往祖辈曾经停泊并为之命名的岛屿，去掀起人生更大的风浪。

岛屿在潮汐的推动下逐渐远离乡土，这离令人梦绕魂萦的大陆架。不过它还是会时间的缰绳紧紧拽住，须臾不舍。海南岛所给予人们的记忆，似繁星似电光闪烁在每一个不凡的梦乡。枕手而眠的日子，伴随日暮西下升起的炊烟，把慵懒的时光阅读。令人恍惚的画面。寂寥，以及父亲驾着牛车从凌晨的鸡鸣声中走向大山深处，然后在夕烟弥漫中载满柴草归来。那时，作为孩子的我，能做到的就是在离家稍远的山坡空地上点亮篝火，让疲惫不堪的父亲看见光亮，让他明白是我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他。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的祖先是被放逐到岛上来的，先人的理想和昂起的头颅悲壮且酸楚，但这一切已经被岁月埋葬。昔日的凄风苦雨已然变得云淡风轻。祖辈孤独且坚定地面对长天，无限感伤但也欣喜若狂，在辽阔的海一方，他们能够拥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更加知足并且深深感怀。

岛上的夜晚，往往被狗吠声主宰。在火塘边上烤火的老祖母，已到期颐之年，她一边哼着自编的小调，一边翻动着芳香四溢的番薯。她总是如此气定神闲，每每想起自己的家族在天涯海角扎根繁衍，且无惊无险，她的嘴角就会油然泛起笑意。一辈辈人的休养生息在天涯得以侥幸实现，夫复何求。守护祖先的坟墓，坦然面对未来，在暮色中点亮灯火，品尝低烈度的土酒和腌鱼，然后悠然睡去。等到醒来之后，所认识的文字仅够辨认祖先留下的谱牒，这样就足矣。触动心弦的诗，留给波浪；覆盖季节的落叶，留给清风。没有更多的烦恼，没有与谁过意不去，没有亏欠，一切刚刚好。在这些朴素的叙述中，我有时还会忽然想起少年时炸响在屋顶的惊雷，它仿佛紧挨着我的头顶狠狠砸下来，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令人忽然间感觉人生志志不安起来。不过还得仰赖大海弥合了一切苦难和挣扎。离乱和思念，被雕塑成一座巍峨的望京之塔。日暮途穷吞噬，嗟叹何地，又有何人知晓？在一呼一吸之间慢慢变得亲切，飞鸟带来的消息和迥异于海内的风物与祖辈不期而遇，一尘不染的花草都好像被神祇用深情的手擦拭过似的，光洁而出类拔萃。汉唐的风吹拂着天涯游子，并留下深深的追忆。我不止一次面对大海，搵去它莫名伤感的泪花。

西部的山路上几乎都布满荆棘，雨季来临之际，更是泥泞不堪。人们可以想象，当年踏上琼州崎岖险峻的官宦学士，他们将多么狼狽，餐风露宿生死茫茫。身陷岛上的他们食无肉，居无所，行无友，吟无朋。他们就像孤独的魂魄，无助地漂泊在偌大的岛上。无眠的客心，艰窘的物质生活，难以把握的命运，催生了他们的万丈文思。身临绝境，他们犹可歌可哭，可彻底抛开个人得失，解脱成一个悲天悯人的老者。但愿天涯从此无故事，人生从此无波澜。追忆千年以前的唐宋，前贤李德裕把自己对天涯的无尽眷恋，写成千古不朽的佳句“青山似欲留人住”，东坡却甘愿寄余生于帆樯，赵鼎则洒脱地身骑箕尾归于天上，李光则引吭高歌欲乘风月叩天关。悠悠天地间，徒留下一腔看透沧桑事后的恬然静气，这又何尝不是人生谢幕前的一大收获呢。

风过西部的山峦、雨林和海面，除了季节和人的改变，西部的沉默依然难以被攻陷。山川和大地仿佛藏匿了岁月的万千秘密，不肯随意吐露心声。雨滴冒着烟气砸在滚烫的沙地上，很快就沁入大地张开的焦渴的嘴。远处的森林闪着寂静的光，它们把难懂的孤傲给予了西部。我的想象力迅速打开豁口，执执意念被大风送远的帆影，以及被托举于天上的星辰，始终想不明白它们在为谁而闪烁。为了能够抵达海岛的彼岸，——那令人魂牵梦绕的大陆，我居然想起船。那些停靠在原始码头上的木船，都是用森林的骨骼制造而成的，它们在未来的航程中会抵御令人惊悚的风暴和水面下黑魃魃的暗礁。

行走在大海边上，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会默然回响在耳畔：“我知道你仍活着，穿过了遥远的距离与空间，因为你，我无所畏惧。你停留在我心深处，我心一如往昔。”大海横亘在眼前，浪花触手可及，它以平静的姿态宣告风暴即将来临，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一如蛰伏在心底的激情，秘密而永恒。

这几年，我接受撰写长篇报告文学《莺歌之海》的任务，一边系统地查阅盐场开发初期的档案资料，一边采访参加盐场建设的“盐一代”。在档案馆里，一页页发黄的文字，牵动着我的神经，尤其是采访那些年过九旬的亲历者，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从勘测进入莺歌海到建成南方最大的盐场，我全面梳理这一过程的艰辛和曲折，挖掘出莺歌海的一种精神。

吴坤新是作为勘测队员最早来到莺歌海的“盐一代”。1955年11月，他放弃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莺歌海参加盐场的勘测工作。他的岗位是在水道口潮位观测站勘测水文，在一间用茅草搭盖起来的棚子里，24小时和同事们轮流值班。水道口离村庄较远，偏僻、荒凉。白天的太阳很晒，让人连背心都不想穿；晚上天气闷热，蚊子嗡嗡直叫。

1956年深秋的一天晚上，吴坤新在观测站值班，海面上风平浪静，可一会儿的工夫，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而下，海浪扑向沙滩，工友一组的水尺被浪冲击得左右摇摆，紧缚着水尺的钢丝眼看就要被挣断。在这危急关头，他顾不上顾身地抱着水尺。这时，冒雨前来检查工作的一位领导发现他要被海浪卷走，便冲下海把他紧紧抱住。幸亏在水道口附近综合技术站值班的队员们及时赶到，经过3个小时的抢险，才把水尺加固，还获得了平时难以得到的水文数据。

吴坤新回忆说，当时，队员们在湖边搭起茅草棚，吃住都在里面。低矮的条木床上用椰子叶铺上，权当床垫。附近没有水井，连洗漱的水都要到很远的地方提回来。蚊子都贼精，蚊帐上有个米粒大的小洞也能钻得进去。蜈蚣、蝎子常常趁夜深人静爬到蚊帐顶上，有时还会突然发现一条青蛇从外面溜进工棚。因此，在夜里，队员们常燃烧些牛粪杂草，掺进一些辛辣的植物，让刺激的熏味驱赶蚊虫蛇蝎。有一晚，一位水文观测员到湖边看水尺，回来

如烟往事

盐一代

■ 方世国

时认不出方向，走进越来越深的水草里，被齐腰的湖水困了十个小时。

廖国标是从部队主动“降级”来当军工的。我采访他时，他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1958年春节前，部队动员士兵退伍参加莺歌海盐场建设。廖国标就主动向组织申请转业，报名加入建设祖国队伍的行列。当时，他在部队是副排级干部。领导说：“这次动员的对象是士兵，干部身份不属于动员范围之内。”廖国标说：“海南岛需要我们去建设，我义不容辞，坚决响应。”领导见他一腔热血，又态度坚决，就同意了。

1958年3月初，廖国标和战友坐着军舰从湛江来到莺歌海。大部队上岸后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工地。他们看到的是无际的荒滩、淤泥，水里是比人还高的芦苇，沙滩上生长着仙人掌和带刺的野草。廖国标担任排长，带领一支30多人的队伍，在工地上挖土、铲土和挑土。他不仅和工兵们一起干活，而且比别

人干得还多。他身体瘦小，挖土、挑土这种重体力劳动已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但为了带动大家，他咬紧牙关，像小老虎似的，两个簸箕一根扁担，满满的一担泥土挑在肩膀上，飞奔前行。

廖国标说，盐场建设初期，机械设备很少，劳动力也紧缺。按原设计要求，施工机械80台，劳动力2万人，而当时的劳动力最多时只有近万人，机械设备只有广东省公路局一个机械筑路队的10余台旧机械。但建设者们并不气馁，上千万土方工程量，以人力为主，用铁铲铲、用铁锹挖、用肩膀挑，像愚公移山一样去完成。

第一代女盐工黄玉楼的丈夫是退伍兵。她随丈夫来到盐场挑盐土，第二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年既没有产假，也没休息日。她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她在挑盐土时，突然肚子疼痛起来。她迅速赶往医院。刚到医院，孩子就出生了。这个礼拜之后，她又回到了工地。黄玉楼说，像她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盐场里的女工都是这样过来的。

回忆当年，黄玉楼说，地瓜干、白米粥、“联排”茅草棚、不封顶的泥巴墙……这是“盐一代”集体的记忆。后来遇上三年困难时期，盐场建设工作很繁重，都是体力活，很多工人都不堪重负。可廖国标照样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59年，盐场的中心工作从“边施工，边试产”转为“边施工，边生产”，部分滩池由试产转为生产。11月底，一列火车缓缓驶进盐场的核心区域——结晶区，满载着第一批原盐，在黄流至榆林的铁路线上奔驰，从100公里外的安游港输出，运送到全国各地。

1962年，盐场建设已初成规模。郭沫若视察莺歌海时，为盐田的壮美景观所激动，挥毫写下了壮丽诗篇：盐田万顷莺歌海，四季常春极乐园。驱遣阳光充炭火，烧干海水变银山……

诗路花语

二月二(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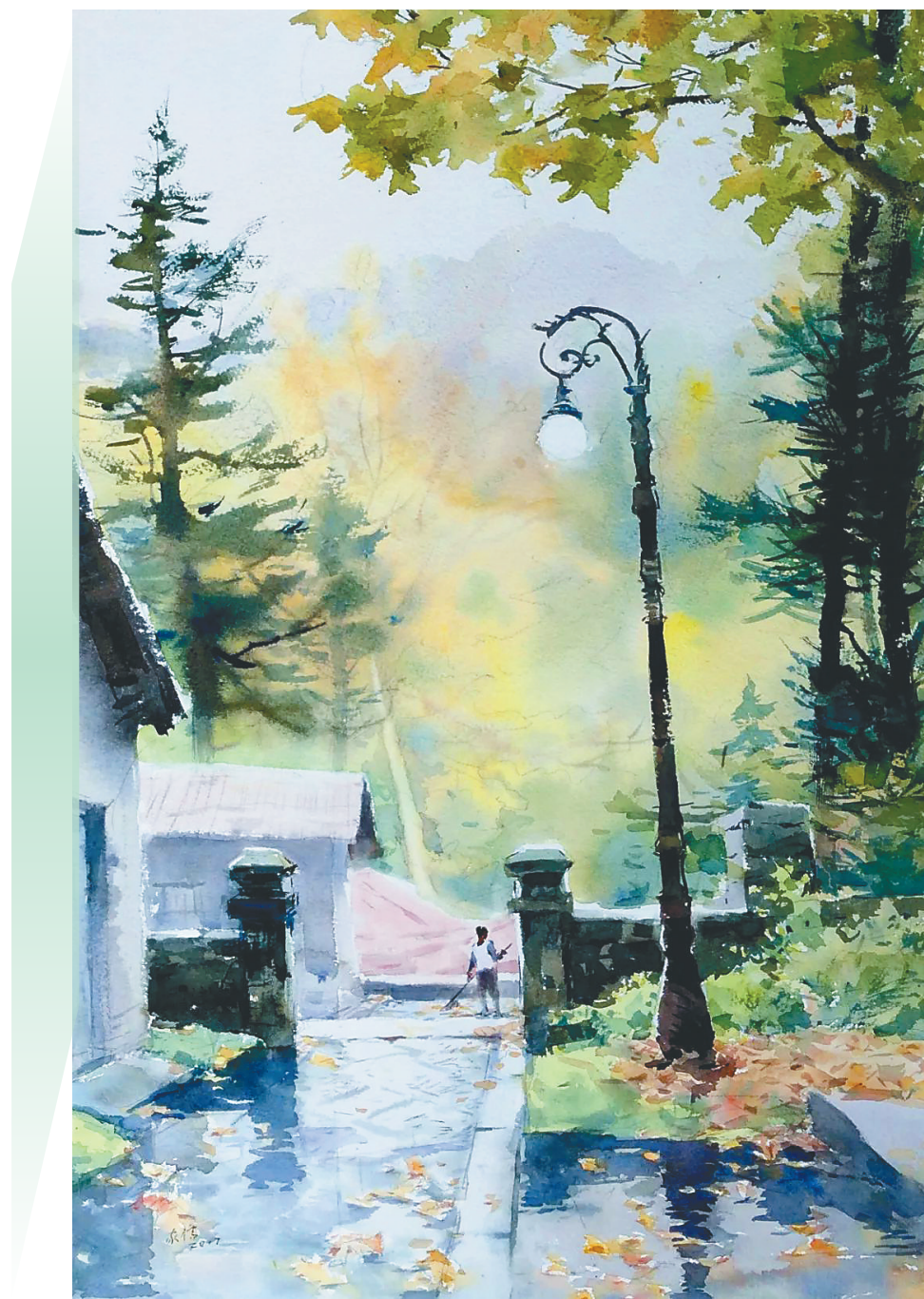
■ 唐鸿南

正是这个时节
我被一碗碗山栏酒
倒出了乳名
坐于三月的肩上
一座座大山
随之醒来
它们连同三月抒情
也醉了
但仍未感到疲惫
这个春天
已经没有季节
这个三月
只有欢乐
我的爱
同样跌进
三月的誓言
不在酒中
不在路上
而在
青山和绿水之间

☆往山里去

往山里去
往山里去
走过村
走过寨
走过星光
燃烧的火把
走累了
就倒地而睡
山路是我的
梦想是我的
我是山的孩子
我是水的歌声
我会一直走着
走过三月之后的
春光乍泄
走到山门的
大榕树下
倾听山风路过船尾
以及那些
酒香落地的声音

《如烟引幽叶》(油画) 王家儒作



陶渊明归隐田园，世人多以为他只是为了寻求清静，躲避乱世。其实，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背后，蕴含着对土地深厚的感情，是对农耕生活的真诚向往。

人们往往只看到他悠然自得的一面，却忽视了其中的艰辛。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天不亮就起床劳作，直到月亮升起才回家，这样的辛劳并非一般人能够承受。他笔下的田园生活，不是文人墨客想象中的闲适雅趣，而是需要付出汗水的真实劳作。“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样的自嘲，既道出了农耕的辛苦，也表达了对劳动成果的珍视。草长得比豆苗还茂盛，这不正是对农事艰难与收成不定的真实写照吗？

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真实地展现了农耕生活的两面性，既有“暖暖入村，依依墟里烟”的诗意，也有“力耕不吾欺”的艰辛。他将文人的才情与农人的劳作相结合，在土地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当其他文人沉醉于宴饮吟咏时，他却俯身田间，与土地平等对话。

在中国古代文人传统中，劳动常被轻视。孔子曾斥责请教农耕的樊迟为“小人”。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农耕是“小人”之事，君子应当“谋道不谋食”。但陶渊明不同，他既谋道也谋食，并将谋食视为谋道的基础。他的归隐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了一种更艰难的生活方

带月荷锄归

■ 张宏宇

式，通过双手自给自足，在劳动中感悟人生。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写道：“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在美好的时光里，他选择独自劳作；兴致来时，便放下手杖除草培土。这种劳动是自主的，与内心节奏相合，因此虽辛苦却快乐。

陶渊明对劳动的坚持，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质的追求。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称“闲静

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这种安于清贫的态度，实际上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生存智慧。他明白，只有通过劳动获得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陶渊明并不回避劳动的辛苦。“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描写了农耕生活要面对的自然环境；“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直接表达了农家生活的艰辛。但正是这种艰辛，让生活有了真实的分量。没有经过劳动磨砺的生活，终究显得轻浮。陶渊明的选择，是对生命厚重感的追寻，是对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

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劳动与诗意和谐共存。农耕的辛劳孕育了“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带月荷锄归”的劳作催生了“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劳动不是诗意的对立面，而是滋养诗意的土壤。真正的诗意从不回避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平凡中提炼出生命的真谛。

“归去来兮！”陶渊明的呼唤穿越千年，依然叩击着现代人的心灵。虽然我们已难觅原始的田园牧歌，但在现代生活中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劳动之美。劳动的意义不在于轻松愉悦，而在于真实纯粹；不在于丰硕成果，而在于过程体验；不在于逃避责任，而在于深入生活。

陶渊明对劳动的赞美，本质上是对生命的礼赞。

文艺随笔

一缕书香

■ 明斋

春日迟迟，南浔古镇柳色如烟，溪水碧波荡漾。我踏着青石板路，循着鹁鸪溪的潺潺水声，走向嘉业藏书楼。小莲庄的紫藤花开得正盛，嫩绿的柳树枝条随风摇曳，而藏书楼却静卧于一汪水畔，黛瓦白墙，仿佛一位沉静的老者，在喧闹的春光里，独守着一方清幽。

楼外荷花如瓶，池中小岛状若龟龟，岛上有亭，翼然临风，太湖石堆叠成十二生肖，其中“啸石”孔窍幽深，据说若凑近吹气，便有低沉呜咽之声，如历史空谷传来的回响。这园林非为游赏，实为书斋而生，一草一木皆在默默守护着那些沉睡的墨香。

步入藏书楼，天井开阔如镜，四角水缸盛满天光云影，暗合“天一生水”的古老智慧。回廊环绕，落地长窗透进温煦的光线，照在青砖地上，投下“嘉业藏书”篆字花格的斑驳光影。我抚摸着透着凉意的窗棂，指尖触到的是百年前刘承幹先生为护书而设计的巧思——铁皮与玻璃双层结构，既增强密封性以隔绝湿气，又提升防盗能力，更隔绝了尘世的喧嚣。

仔细观察，藏书楼主楼是呈“口”字形的回廊式两层砖木结构，由前后两进厅堂与东西厢房围合而成，共五十二柱。中央天井方正如砥，四周檐廊以粗壮楠木立柱支撑，柱础为整块青石雕琢，刻有简洁纹样。墙体下部以五六尺高的花岗石砌筑，坚实厚重；上部青砖垒砌，白灰勾缝，素净中透出骨力。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内部构造：每间库房的地板皆以厚实柚木铺就，防虫防腐；书架依墙而立，通体樟木打造，纹理细密，散发幽微的辛香。所有朝向天井的库房均装着落地长窗，窗扇可完全卸下，使空气能够穿堂而过——这便是百年沿用“自然呼吸法”，让江南湿气随着晨昏的流转而悄然消散。

绕楼参观，隐隐可以嗅到从樟木书柜中散发出的岁月沉淀的幽香。玻璃展柜中，《前四史》的宋刻版本纸页微微泛黄，《永乐大典》残卷静静地躺在书柜里。听着导游绘声绘色的解说，仿佛看到了当年刘承幹在上海“求恕斋”中，于乱世烽烟里抢救散佚典籍的身影——他倾尽家财，十余年间收尽十余家藏书楼之精华，终使二十万册典籍在此安身。然而，藏书楼的命运却几经惊涛骇浪，特别是日寇铁蹄踏碎江南时期，南浔几成焦土，嘉业堂却能够奇迹般幸存下来，主要原因是藏书楼主人刘承幹早就将珍本孤本运到了上海租界；又说他故意抽去珍贵书册的首尾两卷，使得日军不屑于掠取残本——两说并存，恰如历史迷雾中闪烁的微光，映照出乱世中文化命脉的脆弱与坚韧。

更为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1940年代。当时，江南沦陷，各方势力如饿虎环伺：日本人控制的“满铁”，开价六十万银圆欲购走全楼的藏书，汪伪汉奸、北平书商乃至哈佛燕京学社也都虎视眈眈。1940年1月9日，郑振铎联合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辅、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依靠当时中央图书馆提供的中庚庚款，与日本军政人员、日伪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化争夺战。

郑振铎先通过浏览目录划定大致购买范围，再和特意从重庆潜回上海的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一道，在刘承幹上海藏书处浏览近半个月，从2700多部古籍中确定了购买书目。最终在1941年4月，以25万元的价格，秘密买下了嘉业堂藏书中精华的部分，包括明刊本1200多种，钞校本36种，使得国宝免于流散海外。

虽说躲过了日军覬覦的这场劫难，但藏书楼也渐显凋敝之态，直到1949年5月才真正迎来了它的新生。翌年，刘承幹先生慨然将藏书楼连同十余万册典籍、三万片雕版，悉数捐予浙江省图书馆，才使得私家秘藏最终化为天下公器。

步出藏书楼，暮色浸染粉墙，檐角铜铃轻响，回首望楼，“钦若嘉业”的金匾格外醒目；又看到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在藏书楼外侧的书店里进进出出，上前问询才知道是到此访学的学生，刚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人试着做了一件文创作品，兴奋得小脸蛋红彤彤的，放着光亮。目睹此景，我忽然明白，这座藏书楼之所以能够穿越百年风雨岿然不动，并非因砖石之固，而在于它早已成为文明传承的隐喻：从刘氏三代购书藏书的艰辛，到郑振铎“虎口夺书”的孤勇，到今日孩童拓印朱砂的稚手——有无数双手在时间的长河中相继接力，才使得缕缕书香未曾断绝。

返回途中，鹁鸪溪水依旧潺潺流淌，载着游客的画船在河面上缓缓前行；回望藏书楼，飞檐上的鎏金螭吻也在夕照中熠熠生辉。春深如海，花事正浓，然而，我获得最为动人的风景，终究还是那缕不灭的书香。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